

“全球化”背景上的中国诗人如何书写

□张器友

中国新诗自问世起就面临着两大传统,民族诗歌传统和西方诗歌传统,两大传统在20世纪中国特殊历史时期经济、政治、文化作用下的矛盾运动,从一个重要方面构塑了中国新诗的形质。只有正确认识和处理这两大传统与建设中国新诗的关系,秉持诗主体、民族本位、“全球化”背景三者统一观,才能获得一个继承与创新的正确出发点。

近代以来,中国文学所固有的民族根性在变革过程中,因为得到西方近代文学及其文化的冲击和融会而改变自身的局限,得到传承、发展乃至光大。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新诗是古代诗歌在中、外诗歌传统交会过程中的历史性展开,对于我们这个有着伟大诗歌传统的民族来说,只要这个民族不至毁灭,外来诗歌及其文化只能通过这个传统发生作用,外来的东西可以激活它,丰富它,但不能改变它的根性,不能代替它自身的创造,它强大的根系深植于民族生生不息的生命运动,它的本体是中国诗歌而不是外来诗歌及其文化。以西方文化为专治中国“病灶”的灵丹妙药,对民族文化势必虚无主义,对西方文化势必盲目尊崇,都丧失了理性审视和批判的具体问题的认识也是这样。

第二,未能充分利用外来诗歌及其文化激活和丰富我们民族诗歌传统,在把西方诗歌浅薄化、工具化的同时,使得自己的学习变得盲目和狭窄起来。“新时期”国门大开之后诗人们走向了广阔的世界地平线,但心思大了,“人”却小了。这些“先锋”本可以在中外会通的文化广场自由吸纳、自由取舍、自由创造,但他们却都挤到了现代主义一后现代主义一条船上,而且又拼命往后现代的路上倾斜。

在西方,后现代主义诗歌以非理性主义为哲学基石,颠覆既有的文本规则,或打开潜意识闸限宣泄非理性本能冲动,或拼接畸形的表象寄寓强烈的不可表达之感,均在狭窄、决绝、无奈的反叛和放弃中走向解构,走向反价值、反文本的道路。美国的“垮掉的一代”诗歌和“白派”诗歌都是其中的代表。不是说西方现代主义一后现代主义思潮没有成就,但是因为未能健康地“阅读西方”,“比较西方文明内部种种差异和矛盾冲突”,所以只能得其末流,陷在盲目接受之中。其实,他们内部的差异性是大量的存在的。英国的艾略特是现代主义思潮中的象征主义诗人,但他又是一个对传统、知识、文化和理性有着卓越见解的思想者,他强调作家应该具有“历史感”,“正是这种历史感才使得一个作家成为传统主义者,他感觉到远古,也感觉到现在,而且感到远古与现在是同时存在的。同时正是这种历史感使得一个作家能够最敏锐地意识到他在时间中的地位,意识到他自己的同时代”。他告诫青年不要把学习狭隘化、浅表化:“诗人既不能把过去看成笼罩一团,看成一颗不分青红皂白的大丸药,也不能依靠一两个私下崇拜的作家来自成一家,或者完全依靠一个喜爱的时期来自成一家”。法国的萨特是存在主义哲学家和艺术家,宣扬“自我选择”的绝对自由,但他又认为艺术创作是作家“本质”对各种材料和关系的自觉调控,“在人与世界的关系

中,我们是本质的。如果我确定要在画布上,或在写作中描写旷野的某个方面,或是描绘大海,或是描绘我所发现的某人脸上的神情,我知道自己是通过凝练各种关系,引进本不存在的秩序,以统一的思想控制五花八门的事物,这才把它们创作出来的”。他对“本质”的理解与马克思主义不同,但重视作家主体“以统一的思想控制五花八门的事物”,却与现代主义一后现代主义诗潮中对感性和潜意识无限放纵的做法大不一样。并且,西方不同历史阶段的思想文化和文艺思潮对同一问题的认识和艺术表达更是不同,甚至形同水火。人文主义和新人本主义对于理性、非理性的认识便是如此。对其中的具体问题的认识也是这样。

对“远统”未能认真顾及,对“近统”——近百年民族新诗传统,一些人却又抱了虚无主义态度不予承认,他们轻率地认为新诗没有自己的传统。全球性文化交流有一种强势话语向弱势话语流动的倾向,但同时文化发展又存在一种不平衡现象,即经济落后地区的文化很可能以自己的独特性引领世界潮流。对于这一点,恩格斯曾经特别地给予注意,他注意到当时的欧洲,指出:“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在哲学上仍然能够演奏第一小提琴手”。哲学如此,文学和诗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上世纪60年代的拉丁美洲在经济上落后于美国和西欧国家,但其魔幻现实主义文学,“魔幻而不失其真”,又怎么可以同西方世界的后现代末流相比?我国近百年主流文学其中包括新诗的价值也正与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相类似。

近百年来,中国主流新诗接受中华民族现代革命和现代化精神的感召,又受到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文艺及文化,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和前苏联等左翼文学的影响,形成了与中国现代性建构取向一致的主流道路。这个主流起于五四时期,在左翼诗潮、工农兵文学诗潮中得以提升和充分发展,形成了从郭沫若到田间和艾青,到贺敬之和郭小川,再到世纪末王学忠等杰出底层诗人的中国主流新诗谱系。这是一条与20世纪西方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的主流取向不同的诗歌道路。这条道路在价值取向、美学理想等一系列重大问题

上,彰显了20世纪中华民族伟大的民族精神和艺术精神。它把个人的价值理想与民族的、人民的价值理想统一起来,在人民革命和民族复兴过程中实现个人价值,以人民本位为基座高扬诗人主体的自由精神;它看重感性、潜意识在诗歌创作中的地位,但不作非理性崇拜,不搞无限制的非理性宣泄,注重情、理交融的艺术创造,在发展进程中以科学社会主义理性与丰沛情感的自觉融铸为至高的美学境界。我们充分肯定这种主流诗潮,但并不是轻慢了其他各路追求中国现代性及其审美理想的诗人,并不是轻慢了着重接受西方现代主义一后现代主义诗潮影响的流派,这方面凡在今天为人们所称道的优秀诗人,无不看重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诗歌的同时,又接受了民族诗歌传统的滋润,使自己的创作兼具了民族审美现代性品格。而且其中的杰出者如戴望舒、穆旦等人都最终选择了人民革命,在社会变革中自觉地运用诗歌介入社会,并且接受主流诗潮的影响,丰富了中国现代诗歌的美学内涵。显然,如果对这一丰富的民族诗歌“近代传统”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新诗的创新就失去了一个正确的基础,一个实在的起点。

自近代以来,中国文化人在认识中西方文化的关系上经历了一个逐渐成熟的过程。晚清时期,严复广泛“传播欧化”,承认西方近代文化具有超越中国古代文化的进步性,但又看到了中国古代文化与西方近代文化有许多相通之处,提出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归求反观”的思维路线,认为“四书五经固是最富矿藏,惟须改用新式机器,发掘淘炼”。从而为中国的现代性建构确立了一个较为实际的出发点。但是他运用的“新式机器”主要是从西方引进来的“进化论”,在生命的晚期,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民国混乱的现实又使他陷入颓唐,以致最终回归儒家传统之中。严复之后,毛泽东运用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科学总结五四新文化运动,学习西方的经验教训,高度肯定了前驱者向西方寻求真理的举措,同时又指出:“那时的许多领导人物,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他们使用的方法,一般还是资产阶级的方法,即形式主义的方法。……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他提出必须立足中国社会现实学习西方,同时“从孔夫子到孙中山”都必须认真总结、批判继承,以实现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伟大创造。这些丰富的思想,使他在全国解放后顺理成章地明确提出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科学方针。可惜的是,社会剧烈变动过程中的历史性浮躁,使大批的中国文化人,也使大批的新诗批评者和创作者,在这个问题上未能有一个科学的认知和认真实践,因而未能获得充分的自由。

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现代民族复兴伟大精神的扬起,中国新诗的探索者也将会在“全球化”背景下,洞晓处理中外诗歌传统的“必然”,从而获取中国诗人主体书写的自由,创造出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新诗。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历史迈进了新一轮的社会转型和文化变迁,在世纪之交复杂多元的文化背景下,本时期的乡土小说作为百年中国乡土小说历史发展链条上的最新环节,直面思想和审美选择的种种挑战,重新整合中国乡村社会现代转型带来的陌生的新“乡土经验”,其叙事题材、价值取向和美学形态等都因此而发生了许多新的变化。丁帆等著《中国乡土小说的世纪转型研究》一书正是对这些“新质”的开掘和清理。该著著《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入选成果,是新世纪乡土文化与乡土小说研究的重要成果。

乡土小说一直是丁帆所倾注热情的研究领域,《中国乡土小说的世纪转型研究》一书延续了研究者“坚守人文精神,恪守启蒙立场,注重学理价值与文化价值并重,关怀社会价值维度”的学术理念。该著著《社会文化结构而言,中国已经走出了农业文明的羁绊,在现代化的“补课”中,逐渐完成了工业文明的覆盖,社会文化结构的某些部分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提前与西方社会一同进入了人类新的文化困境的命题讨论之中。但中国处于当前现代性、后现代性互渗的文化语境,经济发达区域与中西部“文化滞差”明显,现代性越来越表现出其残缺性。尤其是中国在由半农业半工业社会形态向现代城市化转型的过程中,农村人口转移形成的大移民、大迁徙造成的极大冲击力是全局性的、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对于文学家和研究者而言,这不仅是一场巨大的历史变革,更是史无前例的精神事件。

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乡土小说是否揭示出了中国乡土“去乡村化”的艰难之旅,如何表现时代变迁中各种矛盾的冲突、缠绕和交融,如何辩证地审视现代性带来的新福利与造成的新危机,譬如生态灾难,是否体察并深刻揭示了新乡土经验中的“常”与“变”、疼痛与希望,如何切入价值秩序失范与重构的心灵故事……是《中国乡土小说的世纪转型研究》的研究者所关心的。由此,该著著《以数百部小说文本分析为基础,从“城市异乡者”的梦想与现实,“去乡村化”与乡村现实叙事的时代新变、乡土历史叙事的多副面相、荒诞的现实世界与怪异的叙述风格、乡土浪漫叙事的演进与变异、人性与自然悖论下乡土生态小说的勃兴、宗教文化的“返魅”与“神性乡土”的重构等几个方面来梳理和论述新世纪以来乡土小说创作的成败得失,分析世纪之交文学转型发生的内外成因,审慎地辨析其精神向度、叙事形态和审美意识在转型过程中的变异和发展趋向。其学术视野开阔,立论明晰精当,论述全面而深刻,是新世纪乡土小说研究的系统性和创新性成果,也是一部新世纪文学研究的翘楚之作。

□洪涛

关注世纪文化转型,开掘乡土叙事新质

文以载道 以文化人

文以载道,是唐代大文学家韩愈在“古文运动”中提出的主张,广为后世所运用和遵循。唐代的古文运动是以韩愈、柳宗元为首的一批文人提出的变革文风的重要主张,他们主要是反对和改变六朝时期那种写文章只追求词藻绮丽,但内容空泛,浮艳华靡的文风。这场很有意义的文风变革,不仅对当时的文学发展,就是对后世的文学发展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这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当然,那时所提出的文以载道,主要是载儒家之道,载先王之道,主要主张写文章要为时而作。为事而作,以意为主,“唯陈词以务去”,提倡语言质朴平实,“古文运动”虽然有一定的历史局限,但其主旨是积极的,对后世影响甚大。文以载道已成为众多文人的共识。

今天,我们所提倡的文以载道,其内涵则更为丰富了。主要是载马克思主义之道,载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道;载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载以高尚的道德和美好的情操;载以与时代相契合、于人民有益的先进思想等等。概言之,就是遵循文学的“二为”方向和“三贴近”原则。这既是人间正道,也是文学发展繁荣的宽阔之道。现在中国文学的主要问题是,具有深刻思想、反映时代最高智慧、深刻描写现实社会生活的文学精品力作甚少,而“文学垃圾”挺多,平庸之作挺多。文学的发展与人民的要求还有相当的距离,这很值得我们每一个搞文学创作的人深思。搞文学创作,无论写小说、诗歌,还是散文、戏剧等体裁的文学作品,无一不应和不思虑如何践行文以载道的问题。即

使是写一篇千八百字的短文亦应如此。

再说“以文化人”。这是在以文载道基础上的新发展,是对文学基本功能的高度概括。所谓以文化人,就是用优秀的文学作品教化人、感化人、悟化人、美化人。文学是人学,既是写人,也是写给人看的,应通过文学形象的塑造和所含思想的散发,达到教化、感化、悟化、美化人的作用。教化,是让人们明确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什么应该赞成什么应该反对;什么是真善美什么是假丑恶。当然,教化也绝不是离开文学形象空洞地说教,空洞说教是概念化文学。感化,更是通过文学形象和情感使人有所感动,能够感动人的文学才是生动的文学,深入人心的文学,这样的文学才能在潜移默化中感化人。要以形象感人,以浓情感人。作品看了让人击节赞赏,但其结局泪下,这样的作品才能起到感化人的作用。悟化,即是感悟。一篇文学作品总得给人以某种启迪和感悟,最好给人们以时代最高的智慧和最深刻的思想,让人们能够有所思考,有所醒悟,有所获得。这就是文学的悟化作用。我们读名家名作,都会有这样的作用。而美化,也是通过文学形象的塑造给人提供审美享受。爱美是人的天性,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文学作品为读者提供的美是多方面的,有人物美、环境美、意境美、语言美等等。文学应当用美愉悦人的感知,打动人心,唤起人们对生活的热爱和追求。现在有些文学作品,既不能给人以深刻的思想,

也不能让人获得美的精神愉悦,有的甚至竟不知所云,这样的作品人民群众怎么能够喜欢。看了一篇作品,一无所获,无从思悟,这就是浪费人的时间,浪费人的生命。

要做到文以载道,以文化人,就要求写文章的人本身要有深刻的思想,作家同时也应是一位思想家,缺乏深刻的思想去写作,只能产生平庸作品。作家还应有深厚的文学修养,文学修养深厚的人才能运用各种手段塑造丰富感人的文学形象。文学修养具有多方面内涵,是长期形成的,非一蹴而就。这方面详说起来也可形成一篇很长的文章。凡是已经进入文学门里来的人都熟谙这个道理。塑造文学形象,其手法有高下之分,我们应该学习文学大家们是如何完美地塑造文学形象的。无论何种文学体裁的作品都最忌平铺直叙,都应有形象的塑造,以形象感人。文学作品最忌无感情的抒发,最忌不打动人。不能打动人的心的文学作品就是平庸之作。

文以载道,以文化人,只八个字,文字简单,但践行不易,然而它确实又是文学发展的可贵方向,必须努力践行之。

文学创作必须“独断专行”

这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说的话。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后其首部作品为《盛典——诺奖之行》,说的是他获诺奖后的心路历程,其中有一

个小标题即是“在文学创作中必须独断专行”。对此他解释说:“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应该谦卑退让,但在文学创作中,必须颐指气使,独断专行。”莫言这话道出了文学创作的规律性问题,并把日常生活和文学创作区分开来,很值得深思和践行。

在日常生活中,作为社会的一员,特别是各单位各层次的领导干部,都应当密切联系群众,倾听群众意见,谦逊和众,博采众长,执行我党根本的工作路线即群众路线,而脱离群众,主观主义、官僚主义,自以为是,独断专行,实不可取,都在改正之列。而文学创作则不然,它基本属于个体的创造性劳作,这其中最为可贵的是创造性和独创性,这是文学创作获得成功的最基本条件。而那种千部一腔、千人一面的作品,实属公式化的表现,其中缺少的就是创造性和独创性。在文学史上,凡古今中外的名著都因具有独创性而博得读者的欢迎。这次莫言获得诺奖,其作品也有这样突出的特点。但是以往因各种原因,在文学创作中公式化颇为普遍,这是我们文学创作中的一种教训,甚当记取。

目前中国每年出版的文学作品不少,但具有独创性,读起来令人耳目一新的作品依然不多。这就影响了整个文学作品的质量。无论是鸿篇巨制,还是单篇短文,都需要独创性,在题材的截取运用、作品思想的概括提炼、创作手法的具体表现等方面,都应体现创造性和独创性,而不应

人云亦云,生搬硬套。文学创作要做到有创造性或独创性,就需要作者有很强的独立见解,有丰富的文学积累,对生活有独自深刻的理解,有区别一般的创作手法。独创,是文学创作的最高水准,最高境界。

当然,文学创作的创造性和独创性也绝不是脱离生活的胡编乱造,故作惊人之笔,绝不是拒绝借鉴经典作品仅自己苦思冥想,绝不是拒绝各种具体有益的意见而固步自封。莫言所说的文学创作必须要独断专行,我的理解,是指作品的立意、构架、手法、语言等大的方面而言,在这些方面都要有自己独特的创造,而不受外界干扰。但是对于错别字或语法不通这些小毛病,还是应该接受正确意见改正之,而不应固执己见。

文学创作要做到具有创造性和独创性,用莫言的话说就是“独断专行”,除了克服自身的平庸和无创建之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有勇气排除来自外界的各种干扰,各种强行的意见。现今创作自由度扩大了,写什么和怎么写,都由作家自己做主,不像过去在这方面领导总要发号施令,表达强行意见。当然,这种现象至今依然存在。这就需要作家有独创的勇气,有坚持自己正确意见的勇气。说起来容易,在实际文学创作中,这种情况却很复杂。这就需要作家有力排众议的主见,有敢于坚持独创的主见。

作为有关领导,应欢迎作家的独创精神,在坚持正确的文艺方向和创作原则的前提下,领导应支持作家独创,不应限制和干预。作家创作的“独断专行”和领导的理解与支持分不开。领导应成为作家“创作独断专行”的后盾。

独创出精品,独创出人才。作家应当多有独创精神,让我们的文学呈现从一花独放到百花齐放的喜人局面。

本报讯 近日,鲁迅文学院相继召开研讨会,分别对章泥和许烟华两位高研班学员的作品进行研讨。

章泥是来自四川的青年作家,创作了《荒山菊》《两个人的杰作》《月黄昏》《菩萨石》《尘归尘,土归土》等中短篇小说。与会者认为,章泥小说构建了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一个是世俗的现实世界,一个是灵异的意象世界。这两个世界截然不同,但却有一种内在的逻辑勾连,这便是作家对她笔下人物生存境况、存在价值的审视与思考。这让她的作品一方面富有荒诞性,一方面又蕴含真实性,文体和写法上奇异、独特,读后让人感觉意味深长。

许烟华是来自山东的青年诗人,与会者对他新近出版的诗集《烟华》进行讨论。大家谈到,许烟华的诗具有敏感的现实意识,能在平凡的生活中发现瞬间的诗意,并为之赋予优雅而简约的永恒意味,表现出强烈的自省精神、人文关怀和现实担当。他的诗作散发着粗粝之美、智性之美,真实表达了一个活在当下的诗人的生存体验。他的诗貌似是口语的,但在本质上更接近知识分子的书写,因为诗里有足够的怀疑、愤怒和不妥协。而且,他在语言的把握和调度上具有很强的节奏感。(张文)

赵丽宏获塞尔维亚金钥匙奖

本报讯 近日,塞尔维亚第44届“斯梅德雷沃国际秋季诗歌节”组委会在贝尔格莱德举行新闻发布会,诗歌节主席戈兰·乔尔杰维奇在会上宣布,将2013年“斯梅德雷沃城堡金钥匙奖”授予中国诗人赵丽宏,以表彰他在诗歌创作领域的成就。

斯梅德雷沃国际秋季诗歌节始于1970年,每年均将“金钥匙奖”授予一位

在国际上享有盛名的诗人。

40多年来,“金钥匙奖”获得者大多数是欧美诗人。赵丽宏是获得此项大奖的第3位亚洲诗人,此前中国诗人邹荻帆(1993年)、日本诗人白石嘉寿子(2010年)也曾获此殊荣。10月15日至20日,赵丽宏将受邀赴塞尔维亚参加颁奖仪式,他的诗集《天上的船》也将由塞尔维亚诗人德拉甘·德拉戈耶维奇译成塞语在塞出版。(欣闻)

张家口中小学获赠12万册图书

本报讯 北京世界华人文化院继今年向甘肃和贵州两所中小学捐书助教外,又向河北省张家口市10所中小学捐赠价值300余万元、12万册图书。这些图书涵盖《世界文学名著百部》《中国文学名著百部》《青少年自然科学探索文库》《青少年知识文库》《十个为什么》等,实用性、启示性、可读性三者兼顾,为中小学生的健康成长提供了丰富的精神食粮。(占英)

《天天都有大太阳》研讨会召开

本报讯 近日,由河北省作协等单位联合主办的康志刚长篇小说《天天都有大太阳》研讨会在石家庄市召开。雷达、艾克拜尔·米吉提、董兆林、贺绍俊、封秋昌等40多位评论家、作家从不同视角对这部作品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研讨会上,艾克拜尔·米吉提介绍了《天天都有大太阳》发表和获奖的情况。这是康志刚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作品2012年在《中国作家》第一期推出后,在社会上引起一定的反响。在今年3月的第二届《中国作家》剑门关文学奖评选中获奖。与会者认为,《天天都有大太阳》是一部正面描写当今乡土现实生活的作品。它表现了农民近30年来经历的裂变和阵痛、奋斗与彷徨,具有浓厚的泥土气息,塑造了鲜活的人物形象。作品结构精彩,语言质朴。(占英)

中德双语朗诵会在京举行

本报讯 7月8日,由诗文杂志社和北京歌德学院联合主办的中德双语诗歌朗诵暨研讨会在京举行。

研讨会上,叶廷芳介绍了中德双语翻译的历史概况,并结合具体译作分析了当下汉诗德译的相关问题。诗人道辉、刘筱、魏巍卡对当今不断有中国诗人作品翻译成德文表示祝贺。

(欣闻)

专家研讨陈廷一作品

本报讯(记者 余义林) 7月16日,由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和中国青年出版社联合主办的《民国四大家族全传系列》作品研讨会在京召开。这套丛书由陈廷一历时10年创作而成,包括《蒋氏家族全传》《孔氏家族全传》《吴氏家族全传》《陈氏家族全传》,共计190余万字。与会专家谈到,该

丛书全面反映了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历史。同时反映了近代一代仁人志士在推翻封建帝制、建立共和、领导抗战、抵御外侮等卓越的历史功绩。